

論我國近期的翻譯理論研究

楊自儉

青島海洋大學外語學院

近十年來，我國的翻譯工作領域擴大了，除文學藝術外，社科、科技、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和民族語文等方面的譯著，不論數量與質量都有很大的發展；¹成立學術團體，創辦刊物與出版社，開展學術討論與翻譯服務，加強國際交流等工作都出現了嶄新的局面。理論研究的意識有明顯增強，學科建設在各類文體翻譯研究、譯學本體論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三個層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本文擬就十年來這三個層次的研究加以論述。

各類文體翻譯研究

每個學科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其理論研究大都是經驗式的封閉性宏觀描述，有的雖可稱精言宏論，但範疇模糊，解釋不一，當然談不上理論的系統性。筆者認為，我們的譯學研究八十年代以前基本上處於這樣的階段。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類文體翻譯研究有了一個新的進展，除文學作品外，新聞、科技、法律、社科、應用文等文體的翻譯研究逐漸增多。《上海科技翻譯》和《中國科技翻譯》創刊後，科技和經貿等實用文體的翻譯研究顯著增加，此外口譯研究也明顯呈上升趨勢。與過去相比有兩大差異，一是翻譯的題材和體裁廣泛了，突出了使用性；二是研究更細致了。總之可說是進入了各類文體翻譯的微觀研究階段。十年中在這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代表性著作有翁顯良的《意態由來畫不成？》(1983)、劉宓慶的《文體與翻譯》(1986)、《中國翻譯》編輯部的《詩詞翻譯的藝術》(1987)、張今的《文學翻譯原理》(1987)、方夢之的《科技英語實用文體》(1989)、袁錦翔的《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1990)、劉重德的《文學翻譯十講》(1991)等。這些著作有的研究文學中的小說、詩詞、散文、戲劇的翻譯藝術，有的研究科技、新聞、社科、公文和應用文等翻譯的特點與技法。

各類文體翻譯研究的論文發表很多，僅舉幾個方面的例子說明研究的廣度與深

1 見葉水夫《再接再厲，為進一步繁榮我國翻譯事業而奮鬥》，《中國翻譯》，1992年第4期。

度。詩詞翻譯派別很多，英詩漢譯中以卞之琳²為代表的現代派取得了顯著成績，既譯神也譯形，提出了格律移植寬嚴有度，「以頓代步」的主張。江楓進一步指出應「以形傳神，立形存神」。³勞隴⁴對「以頓代步」提出商討，使這一研究得以深入。漢詩英譯方面翁顯良⁵有獨到見解，以意象和節奏為本色，以不切為切，淺中見深。許淵沖⁶屬詩體派，主張意美、音美、形美，近期又用六個字，即：一 (identification)、藝 (recreation)、異 (innovation)、依 (imitation)、怡 (recreation)、易 (rendition)，來概述譯詩的目的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常道與變道。劉英凱⁷與許淵沖的幾次商榷，使音美和形美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高健和劉炳善⁸對散文翻譯頗有研究，堅信「意之所到，風格隨之」，巧勁兒來自真功夫。許國璋⁹主張學術論著要「切譯」，自成一體。段連城¹⁰的「解釋性翻譯」在對外宣傳中頗顯功夫。程鎮球¹¹對政論性文稿的翻譯以嚴謹著稱，陳忠誠¹²譯法律以精確馳名。科技翻譯研究，不但有兩個專業刊物，而且近幾年已開過六次全國性討論會，工作有了較大發展。我僅從所讀有限的文章中知道葉篤莊、方夢之、李亞舒、葉永昌、黃昭厚、閻德勝、劉克璋、劉先剛¹³等都在不同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劉先剛對建立企業翻譯學提出了構想。另外公文、合同、廣告、招標文件等應用文體的翻譯研究也有了初步進展。口譯研究過去很少有人注意，這十年有了顯著進步，胡庚申寫了一篇很

2 《中國翻譯》編輯部《詩詞翻譯的藝術》，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6年，頁329-333。

3 袁可嘉《關於英詩漢譯的幾點隨想》，《中國翻譯》，1989年第5期；《人間要妙譯》，《中國翻譯》，1992年第6期；楊德豫《用甚麼形式翻譯英語格律詩》，《中國翻譯》，1990年第3期。

4 勞隴《我看英詩翻譯中的「以頓代步」問題》，《中國翻譯》，1992年第6期。

5 《中國翻譯》編輯部《詩詞翻譯的藝術》，頁261-289。

6 許淵沖《翻譯的藝術》，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中國翻譯》，1991年第5-6期。

7 劉英凱《許淵沖教授「音美」理論與實踐質疑》，《深圳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關於「音美」理論的再商榷》，《現代外語》，1989年第2期。

8 高健《淺談散文風格的可譯性》，《翻譯通訊》，1985年第1期；劉炳善《英國散文與蘭姆隨筆翻譯瑣談》，《中國翻譯》，1989年第1期。

9 許國璋《論語言》，北京：外研社，1991年，頁246-262。

10 段連城《呼籲：請譯界同仁都來關心對外宣傳》，《中國翻譯》，1990年第5期。

11 程鎮球 "My Views of C-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Writings"，《外語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3期。

12 陳忠誠《法律英譯的失真問題》，《外國語》，1990年第1期。

13 葉篤莊《達爾文著作在中國的翻譯與出版》，《上海科技翻譯》，1991年第3期；方夢之《文體研究和科技翻譯》，《中國科技翻譯》，1989年第1期；《科技翻譯理論研究》，《中國翻譯》1992年第2期；李亞舒《中國科技翻譯學的科學內涵》，《中國科技翻譯》，1991年第3-4期；葉永昌《名詞作前置定語的新發展》，《中國科技翻譯》，1992年第1期；黃昭厚《談談科技術語譯名的審定與統一》，《中國翻譯》，1990年第1期；閻德勝《翻譯科學是應用邏輯》，《中國科技翻譯》，1991年第2期；劉克璋《翻譯的語境效應》，《中國科技翻譯》，1990年第2期；劉先剛《中國歡呼企業翻譯學》，《石油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好的綜述，¹⁴ 從理論、技巧、教學和引進四個方面評述了口譯研究的發展。

各類文體的翻譯研究是微觀研究，這項研究的深入是譯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理論來自實踐，這是第一個層次的理論總結，沒有微觀研究的成果，譯學理論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十年來這方面雖然大有進步，但仍很不平衡。比較明顯的是公文、應用文翻譯研究較少，口譯研究也顯得薄弱，當然其他文體研究的理論深度也很不夠，方法有待改進。還有一件怪事，社會科學著作譯了那麼多，卻幾乎沒有看見這方面的研究文章，甚至連前言後記也寫得不多不好。這大概與搶擇和急功近利有關，恐怕沒認真研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面對微觀研究的這種狀況，要想深入發展，筆者認為應重視三方面：

一、提高譯者語言學理論水平，尤其是文體學水平。這十年之所以取得這樣的發展，重要原因是部分譯者注意了語言學和文體學的學習，王佐良、秦秀白、侯維瑞、程雨民、錢瑗¹⁵ 等人的專著和論文以及引進的文體學著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們的學習還很不夠。任何研究，若缺少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是難以取得進展的，更不可能獲得突破性成果。我們有「文貴得體」的優良傳統，英語有“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mak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a style”（斯威夫特）。只有掌握了文體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才可能進行有效的研究，才可能進一步使翻譯得體。當然文體分析代替不了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感受，這是文學翻譯的一個特殊問題，應專題討論。要提高理論水平當然也需要學習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這是常識問題，不必贅述。

二、轉變觀念，實踐者都來重視理論研究。縱觀我國語言研究與翻譯兩個領域，應該說歷史悠久，著述甚豐，但要說出幾本有分量的理論著作卻十分困難。這是輕視理論研究的傳統所致。具體說就是不願意也不善於對自己的實踐從理論上進行規律性的總結和理論性的闡釋，所以難有重大的理論建樹。這個傳統的影響不可低估，恐怕至今還在起作用。我勸從事各類翻譯的譯者，抽出部分精力對你的實際工作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和探索，這不僅能提高理論思維能力，而且會使實際工作更有成效。恐怕這也是培養理論人才最可靠、最有實效的途徑。

三、各類文體的翻譯研究應向深廣度發展。「廣度」問題比較好解決。譯甚麼文體研究甚麼文體，譯小說研究小說，譯哲學研究哲學，譯廣告研究廣告；從事外譯漢研究外譯漢；從事漢譯外就研究漢譯外；從事口譯就研究口譯。只要從事翻譯實踐的譯

14 見《外語教學與研究》，1990年第4期。

15 王佐良《英語文體學論文集》(1980)、《英語文體學引論》(1987)，北京：外研社；秦秀白《英語文體學概論》(1986)，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侯維瑞《英語語體》(1988)，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程雨民《英語語體學》(1989)、《英語語體學和文體學論文選》(1988)，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錢瑗《實用英語文體學》(199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者中較多的人有了理論研究意識，這個問題就會大有改觀。另一方面就是類中有類的問題，比如公文，除各類法律文書外，還包括宣言、章程、法令、決議、公告、通知、通報、工作報告、公報、協定等。我們的研究應向這些小類深入，這也是廣度問題。「深度」的問題比較複雜，筆者認為除深入一步探討每種文體因素(語音、詞匯、句法、篇章、修辭等)外，應大力加強中外同類文體的文體因素對比研究，尋找語義對應和形式對應的異同，以探索語義轉換和形式轉換的規律。只有這種對比研究得到深入發展，才可能使更多的譯作真正忠實於原作的風格，像王佐良說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另外同類文體還有許多不同的因素，比如同為小說，因時代和作家不同，便有明顯不同的文體特徵。因此文體對比研究是複雜而細致的，其他文體也會因作者不同而有差異。我們的研究也應向這方面發展。

譯學本體論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譯學理論建設有了新的發展，正像葉水夫在譯協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說：「近幾年來，他們〔指大學中青年教師和理論研究人員〕注意運用新學科和各學科的新成就來闡述、研究翻譯理論和翻譯問題。有的學者還提出建立翻譯學的構思。這種把翻譯學和其他學科聯繫起來，開展跨學科的研究，使我們開闊了翻譯理論研究的視野。」¹⁶十年來我們不僅進一步明確了譯學建設的指導方針，而且初步構建了翻譯學的理論體系，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譯論學派。

譯學建設的指導方針，我們過去並不明確，因為譯界長期認為翻譯不需要理論，也沒有理論。1951年董秋斯提出了譯論建設的三條：正確的科學方法、廣泛的調查、深入的研究。當時提出這三條是很高明的，已具有指導方針的基本形態。可惜沒有引起譯界的重視。1986年姜椿芳在譯協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在探討翻譯理論方面，我們既要認真汲取國外各個學派的精華，更要創立自己的學說。我國翻譯界的先驅和前輩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我們要繼承，也要在其基礎上前進和發展。過去提過譯事三難『信、達、雅』，但時代的進展要求我們創立適應我國現實、有鮮明特色的現代翻譯理論體系。」¹⁷我把這段話緊縮成「繼承我們的寶貴遺產，汲取國外的精華，創立適合中國需要的現代翻譯學」。我認為這就是我們譯學建設的指導方針，十年來譯界在這個問題上逐漸形成了共識。主張只繼承不汲取或只汲取不繼承的人都越來越少了。「創新」成了譯學研究者思索的中心課題。這是一個很大

16 見《中國翻譯》，1992年第4期。

17 見《中國翻譯》，1986年第4期。

的進步，是理論發展的基礎。不過繼承和汲取的內容尚待深入研究，因為這是創新的前提，否則難以使中外精華相結合產生新的理論體系。

中國的翻譯學理論體系已於 1988、1989 兩年間初步構建問世。筆者謹舉出兩個證據。一是黃龍的《翻譯藝術教程》(1988)，二是劉宓慶的《西方翻譯理論概評》(1989)和《現代翻譯理論》(1990)。¹⁸黃龍在此書中講了翻譯的十三觀四性一法，包括譯學的功能、性質、原理、標準、方法、神韻、美學、風格、教學、翻譯家以及語言心理學、人工智能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劉宓慶的文章在評述西方譯論的基礎上簡述了他的翻譯學的理論體系，分內部和外部兩個結構系統。內部系統由翻譯理論(基本理論、方法論、程序論、美學、教學法研究)、翻譯史(翻譯發展史、譯論史)和翻譯信息工程(軟件研究、機譯技術理論和機譯語言理論)三部分構成。外部系統包括哲學、社會文化和語言符號三部分，為譯學的基礎理論參照系統。由此他得出結論說：「翻譯學完全有資格成爲一門獨立的、綜合的、開放的學科，不必也不應依附於任何一門學科。」1990年《現代翻譯理論》一書問世，標誌着他的譯學理論體系正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誕生了。從範疇的開拓與界定、理論系統的層次與結構和全書論述的方法等方面與黃先生的《教程》相比，劉先生的《現代》更具理論專著的科學性和系統性。當然黃先生的著述也自成體系，獨到見解和精采論述全書隨處可見。

另外還有些研究也有了譯學理論體系的雛形。王佐良在《新時期的翻譯觀》(1987)中講了七個問題，涉及譯學傳統、譯論、標準、文體、讀者、方法、譯者素質和專題研究。譚載喜的《試論翻譯學》(1988)簡述了譯學理論所含的普通、特殊和應用三部分；普通譯學包括實質、程序、原則、標準、方法和矛盾幾部分。金隄的《翻譯學與等效論》(1989)論述了他對譯論的思考，分基礎理論、本體理論、專項研究和技巧研究四個門類。基礎理論是跨學科研究，本體理論中包括五個關係問題(形式與內容、靈活與準確、語義與語境、異國情調與翻譯腔、標準與其上下限)。楊自儉在《關於建立翻譯學的思考》(1989)中提出翻譯科學的體系應包括翻譯工程(人工和機器翻譯，屬工程技術)、翻譯藝術(各類文體的翻譯研究，屬技術科學)和翻譯學(哲學、美學、方法論，屬基礎科學)三個層次，隸屬思維科學。田菱在《翻譯學的辯證邏輯學派》(1992)¹⁹中宣稱「翻譯學是一個統一於七維空間的靜態結構，也是一個流變於七大學科的動態系統——在哲學的協調下，譯文經由語言學和心理學等向中心學科流變」。這七大學科是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文化社會學、邏輯學、翻譯學、各該門中心學

18 黃龍《翻譯藝術教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劉宓慶《西方翻譯理論概評》，《中國翻譯》，1989年第2期；《現代翻譯理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19 本段提及的王文見《中國翻譯》，1987年第5期；譚文見《外國語》，1988年第3期；金文見《等效翻譯探索》第一部分；楊文見《中國翻譯》，1989年第4期；田文見《外國語》，1992年第6期。

科。

金隄曾指出，中國譯界出現了兩派並存的苗頭，稱羅新璋的《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是文藝學派的宣言，其他大都是以發展科學的翻譯理論為方向的。他主張把文藝觀和科學觀結合在一起研究譯學，建立第三學派。²⁰現在看來，科學派(或稱語言學派)至今尚未形成，至少是沒公開打出旗幟。從上邊的評述可以看出大都屬於金隄稱的第三個學派，認為翻譯既是藝術也是科學。我認為這也是譯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學科的性質逐漸有了統一的認識。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科學與藝術、直譯與意譯似乎不應再費時爭高低了，因為實踐證明在科學上這屬於「不可能」的問題，不屬於「未解決」的問題。我們應當集中精力研究翻譯的科學性內容及其分佈規律，研究翻譯的藝術性內容及其表現形式，研究直譯與意譯的關係及規律。這種研究不應只限於文學翻譯，而應在各類文體的翻譯中進行。

這十年來，除上述幾個問題外，其他理論命題也都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發展。這裏加以簡要評述。

翻譯理論基本模式 這是劉宓慶提出的一個理論範疇，它是整個理論體系的靈魂或者叫指導思想。他提出的是重描寫的語義——功能模式。他深入研究了中外譯論，又對英漢兩種語言與文化進行了系統的對比研究，因此這個模式是符合實際的，是科學的。他最近在《中國翻譯》(1993年第2期)上又進一步論證了這個模式的理論和實際的根據。從模式的概述中看不出翻譯中形式轉換的問題，但他在文章中專門論述了形式對應問題，提出了辯證的形義觀和四條參照規範。翻譯的發展會對形式轉換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不會只滿足意義的轉換，今後我們應繼續探討語義轉換的規律，同時也應努力研究形式轉換的問題，它比語義轉換有更大的難度。

翻譯原理 這也是劉宓慶在譯論研究上的一項突破。他深入地探討了語義和語言符號的空框結構中呈散粒型結構(disassemblage)，導致了雙語語義對應的可能性和非對應的必然性，又進一步分析了三種機制和四種轉換模式。許鈞提出了翻譯的思維、語義和美學三個層次，韓忠華提出了翻譯中信息傳遞的雙軌模式，這都對翻譯原理作出創造性貢獻。²¹翻譯原理中有一個重要問題是譯者的思維活動，它很特殊，既不同於原文作家的，也不同於譯文作家的，我們應該深入細致地研究譯者的這種特殊思維活動規律。

翻譯標準 這是譯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翻譯批評的依據。縱觀這十年的研

20 金隄《等效翻譯探索》，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頁5。

21 劉宓慶《現代翻譯理論》，頁59-86；許鈞《論翻譯的層次》，《現代外語》，1989年第3期；韓忠華《翻譯中信息的雙軌傳遞》，《上海海運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

究，三個方面有了進展。一是追求精確性，研究定量分析，以減少定性分析的主觀性。范守義運用模糊數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定量分析(1987)，徐盛桓也提出自己的數學模型(1987)，稱此法叫「半定量分析」。穆雷不但從理論上探討了隸屬度的確定問題(1991)，而且用模糊統計法進行了實驗(1992)。吳新祥等也研究定量分析，他把語言按靜態等級和動態層次，劃分成十五個平面探討原文與譯文的等值關係，但用的不是數學方法。二是探討模糊測度。陳忠華從人的認識、審美和語義的模糊性幾方面論述了翻譯標準的模糊測度。標準的研究追求精確性是進步，但研究其模糊性也是進步，二者應相結合，進一步探討各自的限度及其關係。否定定量分析，不對，但希望值要適度，由於翻譯思維的不確定性，語義形式化的困難，精確分析受到嚴重制約，因此如何處理模糊性問題不容忽視。三是標準的多元化。辜正坤提出了「多元互補論」：絕對標準(原作)——最高標準(抽象標準最佳近似度)——具體標準(分類)。其主要依據是翻譯的多重功能、人的審美情趣的多樣化和讀者、譯者的多層次。黃天源提出「最佳近似度」像「忠實」一樣也是模糊概念，其實也是一種理想的標準。羅選民提出話語層翻譯的七條標準：意圖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連接、意義連貫、章際性和場合性。²²這是一個新的思路、新的開拓。以上都是翻譯標準的新探索，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進展，這是不容否定的。但從我國譯界實際情況看，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在短期內還沒有甚麼標準可以取代。翻譯標準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它的實用價值似乎顯得更重要。因此今後的研究除理論上繼續深入探討外，應十分重視它的實用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更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翻譯單位 這個問題有引進，也有我們自己的研究。羅進德1984年就介紹了國外幾個著名翻譯理論家關於翻譯單位的論述，主要有語義確定法、話語切分法和邏輯分解法。國內研究不多，羅國林、王德春用語義確定法把翻譯單位分為音位、詞素、熟語、自由詞組、句子、話語。劉宓慶認為「句」只是一個基本的翻譯單位，而翻譯的「本位」應為「語段」(text)。他闡述了解碼－換碼中五個方面的分析與綜合，還提出了語段的四種結構模式。呂俊提出大於句子的翻譯單位應是「語段」，並從語義、交際與形態三方面論證了它的存在和可操作性。羅選民運用話語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區分

22 范守義《模糊數學與譯文評價》，《中國翻譯》，1987年第4期；徐盛桓《譯文質量評估的數學模型》，《華南師大學報》，1987年第4期；穆雷《用模糊數學評價譯文的進一步探討》，《外國語》，1991年第2期；《再探討》，《中國科技翻譯》，1992年第4期；吳新祥等《等值翻譯初探》，《外語教學與研究》，1984年第3期；陳忠華《論翻譯標準的模糊測度》，《中國翻譯》，1990年第1期；辜正坤《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中國翻譯》，1989年第1期；黃天源《「似」也是一種「忠實」》，《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3期；羅選民《話語層翻譯標準初探》，《中國翻譯》，1990年第2期。

了話語層翻譯的分析單位和轉換單位，前者為話語，後者為小句 (clause)。²³ 僅就這幾篇文章來看，此項研究有了明顯的進步，都同意由句子發展到語段，甚至到篇章，區分了分析單位和轉換單位，重視了文化和語用因素，而且已由靜態分析進入到動態分析，由備用研究發展到實用研究。但句子以上單位界定不清也不統一是一個突出問題，這跟話語語言學發展不成熟有關。王福祥的研究比較系統，句以上單位叫話語或超句統一體，又分句組、句段和片段 (又叫次篇章) 三個層次。²⁴ 我在翻譯過程中大多以段 (有時是幾個關係密切的自然段) 為理解單位，以句 (包括單句和複句) 為表達單位，當然動筆前的研讀是由句到段到節到章到全文而且要聯繫作者的思想、意圖和時代背景，的確是個動態的分析綜合過程。

美學、風格和神韻 劉宓慶對翻譯美學的研究很有獨到之處，這是他的一項重要學術成就。他不但把握翻譯美學的核心內容：審美客體、主體、體驗和標準，而且對其中的許多項目都有深入而精彩的論述，如原文的非表象美學因素 (包括意境、神韻、氣勢、情態、韻味、風貌等)，非直觀不可計數，但可感可分析。還有藝術觀賞中的「超脫」、審美認識轉化中的時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現審美體驗規律的三種手段等。劉宓慶對風格的研究像美學研究一樣，走出了用「印象性術語」描述總體風貌的「虛幻」境地，把風格因素分九個層次，風格意義分三個層次，轉換手段分成對應、重建和淡化三種。使風格的研究向精確化前進了一大步。劉重德重點從理論和實踐上研究了風格的可譯性問題，並提出用文藝觀點進行宏觀研究，用語言學觀點進行微觀分析的主張。黃龍把神韻這個「一看就懂，一問就糊塗」(季羨林語) 的抽象範疇分成風雅、韻律、情操、靈感四個要素，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而且講得可信可感可為，足見他的功夫至深。²⁵ 翻譯美學和風格的研究不應僅局限於文學領域，而應擴大到各類文體的翻譯中去，各類文體均有自己的美學和風格特徵。再者這個領域以抽象和模糊為主要特點，因此應進一步探討抽象概念的量化問題，為美學與風格翻譯以及這方面的評論找到更多的可為因素和手段。

翻譯家論 我認為翻譯學中應有一章翻譯家論，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是翻譯隊伍建設的問題，是翻譯事業發展的決定性條件。此項研究還停留在宏觀描述上，比較全面的是黃龍的人才觀，包括比較語言、專業知識、世界知識、政治理論、職業道德、

23 羅進德《翻譯單位——現代翻譯學的一個研究課題》，《翻譯通訊》，1984年第12期；羅國林《翻譯單位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中國翻譯》，1986年第3期；王德春《論翻譯單位》，《中國翻譯》，1987年第4期；劉宓慶《現代翻譯理論》，頁92-102；呂俊《談語段作為翻譯單位》，《山東外語教學》，1992年第1-2期；羅選民《論翻譯的轉換單位》，《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4期。

24 見《漢語話語語言學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

25 劉宓慶《翻譯美學基本理論構想》，《中國翻譯》，1986年第4期；《翻譯的風格論》，《外國語》，1990年第1-2期；劉重德《文學翻譯十講》，頁102-127；黃龍《翻譯藝術教程》，頁49-83。

邏輯思維和即席速記七項教育。²⁶關於人才培養問題我有兩點看法：一、建立翻譯系和翻譯學院。這個問題在許多會上都提出過，但至今沒有動靜。大家的建議從實踐而來，是急國家建設之所急，國家教育部門不應置若罔聞。二、譯協應成立一個人才委員會，目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研究不同層次翻譯人才的標準，要具體可行，比如語言和知識的要求應有量化指標等，以提高客觀性和可檢查性。

翻譯批評 這也是譯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十年來取得的進展不大，代表性成果應是袁錦翔的《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可惜這樣的宏觀與微觀分析相結合的論著太少了。另外李文俊和許鈞²⁷探討翻譯批評的文章比較深入，特別是李文涉及到翻譯批評的許多方面，重點論及文字校訂式的批評和對老翻譯家的批評問題。許文分析了「太死」和「太活」兩種傾向，提出了批評的整體性、理性、微觀宏觀結合和導向問題，頗有現實意義。此項工作應重點加強標準研究，它具有全局性決定意義；其次加強評論者的素質建設。素質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水平，二是態度。按茅盾 1954 年提出的要求，需要很高的水平（包括語言水平、經驗、知識、理論思維等）和深入細致的對照研究才能寫出有水平的評論。不具備這種條件又不願進行深入研究所才出現「太死」和「太活」的批評。態度極其重要，它決定批評的方式方法，它是批評者道德品質的體現，當然被批評者也有態度問題，同樣是道德品質的體現。只有二者都出以公心，態度端正，批評才能深入發展。

翻譯教學 莊智象寫過一篇文章綜述了翻譯教學與研究的現狀，並對改革提出七條很有現實意義的建議。十年來翻譯教學與研究的文章不多，劉必慶針對譯界否定理論功能的思想，提出了「翻譯的技能意識」，論證了翻譯理論的認知、執行和校正三大職能和技能意識培養與技巧形成的過程。他在《現代翻譯理論》的第 11 章確定了八項翻譯理論教學的基本內容，還論述了基本技能訓練和技巧訓練的內容與要求，為翻譯教學改革作出了突出貢獻。勞隴認為譯界最嚴重的問題是理論脫離實際，解決的辦法之一是編寫理論聯繫實際的教材。郭著章在翻譯教學上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英漢名譯比較研究，他很注意理論聯繫實際，已取得了初步的經驗。²⁸翻譯教學問題很多，主要是沒得到應有的重視，許多問題沒得到研究，莊文中大都有具體分析。當務之急是在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外語本科專業翻譯教學大綱，對口譯和筆譯，對外譯漢和漢譯外都分別作出具體規定，其中對翻譯理論、雙語對比研究、口譯、漢譯外和應用

26 黃龍《翻譯藝術教程》，頁 295-303。

27 李文俊《也談文學翻譯批評》，《中國翻譯》，1992 年第 2 期；許鈞《關於文學翻譯批評的思考》，《中國翻譯》，1992 年第 4 期。

28 莊智象《翻譯教學及其研究的現狀與改革》，《外語界》，1992 年第 1 期；劉必慶《論翻譯的技能意識》，《中國翻譯》，1987 年第 5 期；勞隴《翻譯教學的出路》，《中國翻譯》，1990 年第 6 期；郭著章《談談英漢名譯比較課程》，《外國語》，1991 年第 2 期。

文體的翻譯都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其次要辦好教材建設和教師培訓。這些都是翻譯教學的基礎工程，確實應集中優秀人才，花本錢下功夫搞好。

翻譯史和譯理史研究 這也是譯學研究的一項基本建設。十年來我們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馬祖毅經過七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 1984), 此書不但材料翔實, 而且對分期、口筆譯關係、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和內容重點等幾個問題都處理得較好。譚載喜經過多年的研究完成了《西方翻譯簡史》(1991)。「有重點、有分析、有系統地勾劃出歐洲和北美翻譯事業的發生、發展及其歷史演變的概貌」, 而且注意了對譯論發展的概述, 填補了此項研究的空白。陳福康在不長的時間內撰寫了我國第一部《中國譯學理論史稿》。此書資料比較豐富, 而且對譯學理論的性質、結構以及歷史分期與寫法都有新的探索。²⁹ 今後這方面的研究除繼續編寫通史、簡史外, 應有重點地開展斷代史(比如唐代、明代、五四時期等)和學科翻譯史(比如小說、詩歌、社科、新聞、科技等)的研究。要充分注意重點人物、重點譯著, 注意文化發展的脈絡, 注意中外文化的相互影響。

外國譯論評介 十年來譚載喜、蔡毅、莊繹傳、勞隴、郭建中、胡眞、穆雷、楊建綱³⁰等在譯介外國譯論方面都很有成績, 他們把不同國家、不同流派的翻譯理論引進了中國, 並注意與中國的傳統譯論相比較, 促進了譯界的理論學習與研究。在中外譯論比較研究中, 王宗炎、劉宓慶、羅新璋、勞隴³¹等做得比較深入, 可稱為這方面的帶頭人。現在看來我們引進的還不夠, 應繼續有選擇的譯介; 但同時應注意聯繫我們的實際, 「介紹的目的是借鑒, 是促進我們的研究, 我們不能老談隔壁人家的事情, 而不聯繫自己家裏的事情。就講介紹吧, 也要下一番融會貫通的功夫, 枝枝節節、依樣畫葫蘆是沒有多大用處的」。³² 今後的引進和研究只有在融會貫通和借鑒兩方面下功夫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跨學科研究

翻譯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涉及原文作者、原作、原文讀者、譯者、譯作和譯文讀

29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餘論》,《翻譯通訊》, 1986年第2期;譚載喜《西方翻譯史淺談》,《翻譯通訊》, 1985年第7期;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緒言》,《外國語》, 1991年第2期。

30 譚載喜譯介奈達的著作, 蔡毅譯介巴爾胡達羅夫和加切奇拉澤的著作等, 莊繹傳譯介斯坦納等人的著作, 勞隴評介紐馬克、奈達等人的論述, 郭建中評介西方等值論, 胡眞譯介利洛娃和蘇聯的譯論, 穆雷譯介卡特福德等人的著作, 楊建綱譯介穆南等法國譯論家的理論。

31 王宗炎《紐馬克論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 見《外國翻譯理論評介文集》,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83年; 劉宓慶《西方翻譯理論概評》,《中國翻譯》, 1989年第2期; 羅新璋《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世界文學》, 1990年第2期; 勞隴《殊途同歸》,《外國語》, 1990年第5期。

32 呂叔湘《序》見陳平《現代語言學研究》, 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91年。

者，可研究的方面很多。王佐良說，翻譯研究「最有理論發展前途：它天生是比較的，跨語言、跨學科的，它必須聯繫文化、社會、歷史來進行」。³³ 縱觀十年來的研究，可以說已經跨出了原來那個封閉的譯論領域，走進了一個開放的新天地。範疇研究和理論命題不再只限於信達雅、直譯意譯和可譯性幾個老問題，而在譯學本體論範圍內有了新的開拓，並且開創了跨學科的綜合研究的新局面。從我讀到的文章來看，不少人尤其是中青年學者都在注意運用哲學、邏輯學、思維科學、心理學、美學、語言學(尤其是對比語言學)、語義學、語用學、文體學以及符號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闡釋和研究翻譯理論和翻譯問題。這就把翻譯學的創立和建設置於人類大文化系統的綜合研究之中，這是符合當代科學思潮(綜合研究在時空中運動着的系統)的。

這種跨學科研究，劉宓慶稱作「翻譯學外部系統」，以下分三個子系統：哲學思維系統、語言符號系統、社會文化系統。三者跟翻譯學的關係都是功能性的，分別作為翻譯學的理論依據、論證手段和參照範疇。³⁴ 這個劃分是很科學的，不僅界限清晰，而且目標準確。在第一個子系統的研究中，劉宓慶主張翻譯的主體是抽象思維，翻譯思維的基本特徵是逆向運動。董史良認為翻譯學是思維科學的一門應用科學，深入研究翻譯思維是譯學研究的突破口。楊自儉強調翻譯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譯者特殊(既不同於原文作者的也不同於譯文作者的)思維活動的規律和方法。劉祖培提出了綜合思維論，閻德勝提出了翻譯科學是應用邏輯的理論命題。³⁵ 筆者認為今後的研究應重點探討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在各類文體翻譯中的活動規律，深入研究推理論證結構和描述顯象結構的特徵和形成過程。另外還應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譯者跟原文與譯文作者思維活動的異同，以揭示譯者思維活動的特殊規律。

在第二個子系統的研究中，劉宓慶完成了一部《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1991年出版，1992年出了修訂本)。此書從微觀分析了詞、語、句、語段等各層次的異同，又從宏觀對漢英表現法和思維方式進行了比較，從而提出了一系列翻譯對策和參照規範。王宗炎從四個方面論述了語言學與翻譯的關係，其關係和文學理論與創作的關係類似，語言學在翻譯中作用是有限制的，因此他不贊成翻譯是科學的說法。侯維瑞通過幾種文體的分析，探討了文體學與翻譯的關係，為譯學的形式論證提供了文體學的手段與途徑。何自然在研究雙語的 Pragmalinguistics 和 Sociopragmatics 的等效問

33 見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北京：外研社，1989年，頁6。

34 見劉宓慶《現代翻譯理論》，頁20-22。

35 劉宓慶《論翻譯思維》，《外國語》，1985年第2期，後作了許多修改收入《現代翻譯理論》一書；董史良《翻譯的思維問題》，《中國翻譯》，1988年第3期；楊自儉《關於建立翻譯學的思考》，《中國翻譯》，1989年第4期；劉祖培《翻譯綜合思維論》，《上海科技翻譯》，1991年第2期；閻德勝《翻譯科學是應用邏輯》，《中國科技翻譯》，1991年第2期。

題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柯文禮、譚載喜在研究語義學與翻譯的關係中，運用詞匯義、所指義、語法義、修辭義、聯想義以及語義的變化、上下層和上下文語義關係等理論，解釋了翻譯中的一些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³⁶ 在這個系統中今後應加強語義和語用方面的對比研究，以探討雙語在表現法和思維方式上的對應規律，為譯學的建設提供更科學的論證方法和手段。

第三個子系統圍繞著翻譯中的文化問題進行了探索。王佐良主張把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化結合起來，還提出譯者必須是真正意義的文化人的命題。羅進德論證了符號學翻譯觀的實質是把譯論的基礎由對比語言學擴展到對比文化學。柯平分析了雙語在指稱、語用和言內三個語義層面上的非對應情況，說明文化差異是翻譯研究的重要課題。穆雷運用接受美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了習語翻譯中文化差異的處理問題。³⁷ 這個系統中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它包括自然、社會、思維三個領域的各種學科。翻譯中的文化研究不是單純各種學科的研究。它要與語言的研究密切結合，要探討翻譯觀念產生、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根源。這個領域的研究除重視新興的學科外，還應重視雙語的哲學史、語言學史和文化學史的對比研究，重點探索不同民族認識世界和表達思想觀念的不同理論和方法。這些內容既是翻譯學的文化內容，又是它的方法論依據。

這十年我們在譯論建設上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我們不應停止不前，應該按照已明確的指導方針，繼續研究我們的傳統譯論，研究現實的實踐經驗，吸收外國譯論的精華，把我們的翻譯學建設成一個有科學理論體系的真正獨立的學科，把我國的翻譯事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36 王宗炎“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外語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4期；侯維瑞《文體研究與翻譯》，《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3期；何自然“Pragmatics and CE/EC Translation”，《外語教學》，1992年第1期；柯文禮“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外國語》，1992年第3期；譚載喜《翻譯學與語義》，《深圳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37 王佐良《翻譯中的文化比較》，《翻譯通訊》，1984年第1期；羅進德《略論符號學的翻譯觀》，《中國翻譯》，1988年第1期；柯平《文化差異和語義的非對應》，《中國翻譯》，1988年第1期；穆雷《接受理論與翻譯》，《中國翻譯》，1990年第4期。